

應召員對保衛臺灣 意願影響因素之研究

撰稿人：吳純騰

摘 要

近年來，隨著兩岸局勢日趨緊張及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後備動員與戰力的效能逐漸成為臺灣國防政策的重要課題，特別是應召員作為戰時軍隊人力動員的核心群體，亦為後備戰力的重要組成，其保衛臺灣意願對於國家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相關因素，並從理性與感性的雙重視角出發，研究主軸除了聚焦於四個自變項，即「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也納入應召員背景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包括「年齡」、「最高學歷」、「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及「家戶年所得」，進一步驗證這些變項是否對應召員的保衛臺灣產生顯著影響。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透過量化方式以Likert五點量表測量應召員對各變項的態度。研究樣本來自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正在接受教育召集訓練的應召員，並以迴歸模型來檢驗研究變項對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威脅感知」對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當應召員感受到較高的中共軍事威脅時，其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意願也會提高。此外，「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亦對保衛臺灣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應召員的國家認同、愛國情懷與對國軍的防衛能力及國防政策的支持會強化其願意投入保衛臺灣行動的決心。

本研究的發現凸顯了政策與心理因素對應召員防衛意願的關鍵影響，特別是透過強化後備戰力、深化全民國防教育以及提升國軍形象，對於增強動員成效的重要性，以期我國的後備戰力能有效發揮。

關鍵詞：威脅感知、美國安全承諾、愛國心、國軍信任感、保衛臺灣意願

* 作者謹此由衷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董祥開副教授與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國防管理教育訓練中心陳甫岳中校教官之悉心指導與寶貴建議，惠予本研究莫大助益，謹致深切謝忱。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俄烏戰爭」不僅引發了國人在面對複雜國際局勢時，對於國家安全與臺灣處境的深刻思考，亦促使相關議題成為國人熱議且關注的焦點，例如：全民國防、美國對臺軍售、臺灣國防實力、義務役期延長等。¹特別是在2022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後，共軍隨即在臺灣周邊海域展開近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實彈軍事演習，凸顯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快速升溫。然而，俄烏戰爭雖然表面上與臺灣並無直接關聯，但隨著「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的說法，已經在國際社會與國內廣為流傳，表示國際社會與國人對於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的憂慮，同時也引發了美國是否會如同支持烏克蘭般，對臺灣提供軍事援助的各種推測與關注。²李冠成研究指出，³當國人內心對於中共軍事威脅的認知程度越高時，不僅會支持增加教召的頻率與天數，還會傾向贊成提高軍事預算，並且對國軍保衛臺灣的能力更具信心。當中共武力犯臺時，除了第一時間受動員召集的後備部隊之外，一般民眾實際參與作戰的機會相對有限。因此，即使民眾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義無反顧投入戰場，但是否能實際參戰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當前兩岸局勢緊張情況下，許多民調機構針對國防安全相關議題進行民意調查，調查

結果顯示在「保衛臺灣意願」與「新制教育召集制度」方面，均有很高支持度(見圖1-1)，代表在面對中共於軍事層面對臺灣的潛在威脅時，更展現出國人團結一致性的態度。至於其他類似議題也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例如：是否支持義務役期延長、美國是否直接出兵保衛臺灣、是否願意上戰場等。政策推行往往會牽涉到不同群體的利益與感受，特別是像義務役徵集或後備役召集。對於被徵集或召集的當事人而言，短暫失去自由並面臨潛在風險，自然會引發內心的不滿或抗拒情緒。尤其在新制教育召集制度與義務役期延長政策下，訓練與服役時間倍增，勢必會讓當事人更加排斥這些政策。值得一提的事，民調雖然可以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忽略了受政策影響群體的心聲，也無法進行深入分析，可能會導致政策推行效果與預期成果容易出現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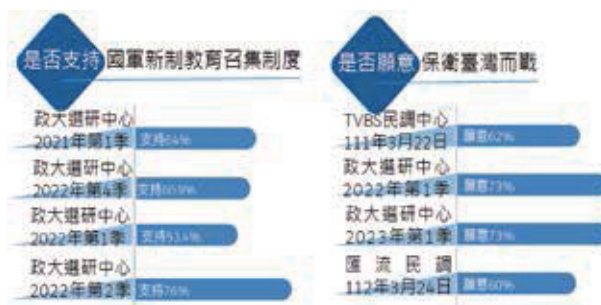


圖1-1 民調機構訪問調查結果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本研究觀察圖1-1的公開民調資料，並非針對編管中的後備軍人進行精確調查，加上後

1 杜長青，〈俄烏戰爭對我國國家安全認知影響之數位媒體文本分析〉，《國防雜誌》，38卷第1期，2023年3月，頁49-74。
 2 謝志淵，〈2022年俄烏戰爭源起、戰略與對我國之啟示〉，《國防雜誌》，37卷第3期，2022年9月，頁19-20。
 3 李冠成，〈民眾對國軍印象不佳的成因及影響：次級資料的驗證與探索運用〉，《復興崗學報》，第120期，2022年6月，頁109-142。

備軍人年齡層分布廣泛，倘若單純以年齡進行區分顯然是不夠的，因此在民意調查設計上，若能增加明確區分的衡量問項，將有助於更準確地分類與分析。然而，近期的公開民調中，仍然沒有見到民調機構採取這樣的操作方式。

二、研究動機

依國軍年度動員準備計畫選充於三軍動員部隊之後備軍人，統稱為「要員」，⁴根據「後退先用」的原則，這些剛退伍的人員因為對編制武器專長較為熟悉，能快速恢復戰鬥技能，故會優先被納為後備部隊選充對象，以確保後備戰力的精實與有效性。根據《召集規則》第2條指出，「應召員」是依照《兵役法》第37條規定應受各種召集的人員，包括動員召集、臨時召集、教育召集、勤務召集以及點閱召集。⁵然而，應召員是新制教育召集制度下，受影響程度最大的群體。後備軍人在退伍後的教育召集訓練通常會遵循「固定編組」與「2年1訓」原則進行，並在隔一年後回到原部隊再接受訓練。退伍8年後(軍官與士官均為12年)，不再收到教育召集令，但仍保有後備軍人身分，戰時可能因動員召集而重新服役，直到達到「除役」年限為止。

由於應召員作為後備軍人的核心群體，在戰爭發生時，將優先被動員參與作戰任務，這也導致應召員防衛臺灣意願的決心與一般民眾有所不同，而且保衛臺灣意願對於國家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應召員平時是普通民眾，但在戰時需要與現役軍人並肩作戰，以致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因素是多層次的(Multi-Level)，不僅涉及個人心理層面的愛國心，⁶還包括中共對臺灣的威脅感知、⁷美國是否履行對臺灣安全保障的承諾，⁸國人對臺灣國防政策以及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心。⁹因此，引發研究者選擇討論本研究主題的關鍵動機，與此同時，本研究主張深入瞭解應召員群體的背景變項及其影響保衛臺灣意願之相關因素，不僅有助於提升後備部隊戰力，亦能作為制定防衛策略、提高國家安全意識等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指引。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回顧以應召員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發現研究重點聚焦於教育召集，例如：蔡宜叡分析嘉義後備旅應召員對教育召集在教育訓練、領導方式、福利設施以及伙食的滿意度、¹⁰吳文淵建構系統動態模型分析後備指揮部

4 中華民國國防部，〈國軍軍語辭典(九十二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2004年)。

5 中華民國國防部，《召集規則》，第2條，2019年7月11日修正。

6 李冠成、游清鑫，〈為臺灣而戰？列項實驗的探索〉，《問題與研究》，62卷第4期，2023年12月，頁105-134。

7 方琮嫻，〈從民調初探臺灣人民自我防衛意識的不變與影響因素〉，《國防安全雙週報》，第78期，2023年5月，頁1-7。

8 康育菱，《臺灣民眾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變遷研究：2018-2020三波調查的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9 林顯桐，《抵禦外侮的關鍵？影響抗敵意志重要因素分析之初探》，(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24)。

10 蔡宜叡，《後備軍人對教育召集執行滿意度之研究：以嘉義後備旅為例》，(雲林：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5)。



教育召集訓練的不同政策，對於教學品質、鑑測成績、額外工作量及供需比之影響，¹¹黃海龍調查中部某後備教召部隊對國防政策認知以及新制教育召集在日常生活和設施裝備、教育訓練、伙食、領導方式、福利設施與實施後滿意度的影響。¹²此外，本研究梳理不同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國人對兩岸發生戰爭的威脅感知、美國履行臺灣安全保障的承諾、情感上對臺灣的認同情況以及對國軍保衛臺灣能力的信任程度，似乎與保衛臺灣意願具有正向影響。惟有關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之相關因素的討論，在目前學術研究仍是付之闕如。本研究從應召員的視角切入，研究主軸除了分析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關係，也試圖進一步找出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之最關鍵因素，進而填補先前研究缺口，希望達到研究目的如下：

- (一)探討應召員對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保衛臺灣意願的現況。
- (二)分析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與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程度。
- (三)應召員對於自身保衛臺灣意願的評估與其對他人(例：同儕或社會大眾)保衛臺灣意願之判斷間的認知差異。

(四)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從實務面提供國防政策可行的改革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因素

大多數歐美國家對於戰爭支持度的研究，通常基於戰爭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且戰場不在本國領土上的假設。然而，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國家在戰爭中的主動權往往無法由自己完全掌控。¹³此觀點與臺灣的情況不謀而合，自從2022年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後，共軍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了一系列的實彈軍事演習，無疑對區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與挑戰。然而，總統府的立場始終清晰明確，即「既不會升高衝突，也不會挑起戰端，堅定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堅守民主自由防線」，不僅展現了臺灣對和平穩定的堅持，也向國際社會表明臺灣有能力、有決心捍衛自身的利益與價值。國防部「備戰不求戰、應戰不避戰」的論述進一步說明，國軍角色是以防禦為主，絕不會主動挑起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這一態度不僅是對內安定民心的重要策略，同時也是對外釋放出一個明確的和平訊號。

當戰爭發生的時候，對社會、家庭與個人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且影響層面廣泛且複雜，包括社會秩序變遷可能導致的階級流動、家庭與個人收入的波動、戰爭期間的資產變動與

11 吳文淵，《運用系統動態學探討國軍組織精簡政策對動員教育召集訓練師資供需之研究：以後備指揮部為例》，(桃園：國防大學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12 黃海龍，《應召員對國防政策認知與新制教育召集執行滿意度之研究》，(雲林：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22)。

13 Wu, C. K. S., Wang, A. H. E., Yeh, Y. Y., & Chen, F. Y. (2024).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force in non-Western and non-major powers: The case of a China-Taiwan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1), pp. 106-122.

財務損失、家庭成員的安全保障與威脅等。¹⁴近年來，針對臺灣民眾及國軍官兵在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時的態度及行為表現，已有許多實證研究深入探討並取得豐碩的研究發現。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展現了臺灣民眾及國軍官兵在中共威脅感知與挑戰面前的堅韌與團結，也為政府在提升國家安全意識、防衛策略等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寶貴且重要的指引意義。¹⁵

Yeh and Wu研究顯示當臺灣宣布獨立引發兩岸戰爭時，¹⁶影響臺灣民眾是否選擇上戰場保衛臺灣的行為，與以下八個變項有顯著相關：性別、對宣布獨立後戰爭爆發的預判、美國是否提供軍事協防、對臺灣人的認同度、籍貫、政黨傾向、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曾參與823砲戰的經驗，其中當美國願意出兵保衛臺灣的可能性越高時，臺灣民眾對於上戰場的意願也會隨之提升，特別是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臺灣民眾，通常具有較高的愛國心。康育菱研究發現，¹⁷影響臺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對美國安全承諾信任感的影響變項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國族認同、國家認同、政黨認同、常看新聞臺立場、兩岸關係評價、對中共領導人的信任感與統獨抉擇，這意味著男性、高中(職)學歷者、具強烈臺灣意識者、認為兩岸屬於不同國家者、泛綠支持者、偏向深綠新聞臺者、認為兩

岸關係敵意程度較低且和平者、不信任習近平者以及具有明確獨立意識者，對美國履行保衛臺灣安全承諾的信任感更高。陳膺昇的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調查影響清泉崗基地國軍官兵與臺中地區民眾對於中共可能武力犯臺威脅認知的因素包括共同身分建構、心理距離、政治信任感與議題涉入程度，¹⁸其中共同身分建構、心理距離及政治信任感與威脅認知程度呈顯著負相關，而議題涉入程度則與威脅認知程度呈顯著正相關，同時也是最具預測力的關鍵變項。

根據方琮燦分析的調查結果，¹⁹未來五內臺灣民眾認為國家安全面臨為重要的威脅依序是：中共可能武力犯臺、少子化危機、能源短缺、經濟發展停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此外，調查也顯示，當民眾內心對於國軍防衛能力有信心時，不僅會提升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態度，也會更願意投入自我防衛臺灣的行動。李冠成與游清鑫研究將臺灣民眾為臺灣而戰意願區分為個人基本特徵，²⁰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軍旅經驗；理性評估，例如：中共威脅感知、對國軍防衛能力的信心以及美國安全承諾；感性認同，例如：統獨立場及臺灣人認同，實證結果指出，大專以上學歷者及具有軍中服務經驗者，對於願意為臺灣而戰的意

14 李雅琦，《誰挺身而出？台灣民眾面對戰爭的態度》，(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23)。

15 同註7，頁1-7。

16 Yeh, Y. Y. & Wu, C. K. S. (2021). When war hits home: Taiwanese public support for war of neces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1(2), pp. 265-293.

17 同註8。

18 陳膺昇，《我國軍民對中共武力犯臺威脅認知與政策立場研究：以清泉崗與臺中地區為例》，(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19 同註10。

20 同註6，頁105-134。



願較高；對國軍防衛能力有高度信心者，以及認為美國會派兵協防臺灣者，其上戰場的意願也相對提高；在統獨立場偏向支持臺灣獨立者，通常更願意上戰場，而臺灣人認同者，除了展現強烈的愛國心，其自我防衛意願也明顯較高。方琮熾分析結果顯示，²¹臺灣民眾的自我防衛意識與美國介入、年齡、教育程度及統獨立場等變項具有顯著相關，意味著如果美國在中共武力犯臺時提供軍事援助，確實有助於提升臺灣民眾對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任感。此外，男性、高學歷者以及政治立場偏向統獨的民眾，除了更傾向於支持自我保衛臺灣，還會展現更高投入保衛臺灣行動的意願。

李雅琦研究指出面對中共長期的武力威脅，²²造成國人願意挺身而出並且保衛臺灣而戰的影響因素，與年齡、教育程度、社會階級、月收入、去中國發展、政治疏離感、社會行動，皆不會影響臺灣民眾上戰場為臺灣而戰的意願；而性別、政黨傾向、政治行動、人民自豪以及政府信心，皆有顯著相關，意味著男性通常比女性更願意上戰場。綠營支持者與政治行動派者，會展現出更高保衛國家的意願。對臺灣有高度認同且身為臺灣人感到高度自豪者，往往具有更高的愛國心，願意為保護臺灣而戰。對政府抱有信心者，在面對戰爭時，會更願意挺身而戰，捍衛所信任的制度及理念。林顯桐的研究指出，²³臺灣民眾對政府體制與徵兵

制度的認同程度、軍民關係的重視程度以及國防政策的信任度，皆與對抗中共武力犯臺的保衛國家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然而，其實證結果與方琮熾等人的研究結論相比，²⁴卻呈現大相逕庭的差異，國家認同及美國安全承諾與抗敵意志呈負相關，意味著國家認同程度越高或相信美國會履行對臺安全承諾的民眾，並不會因此感受到安全保障，導致更不願意在中共武力犯臺時，選擇進入戰場保衛國家。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影響國人願意保衛臺灣並且挺身而出的影響因素是多層次的，²⁵包括可能涉及人口學變項(性別、年齡、最高學歷、籍貫、社會階級、月收入、軍旅經驗、參戰經驗)、理性變項(中共威脅感知、美國安全承諾、國軍防衛能力信心)以及感性變項(國家認同、臺灣人認同、政黨認同、統獨立場)，這些影響因素的相互交織，進一步形成了對於保衛臺灣抱持支持態度與付諸行動的高度意願。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相關因素，參考李冠成與游清鑫的論點，²⁶將應召員背景變項作為控制變項，並加入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以及國軍信任感四個自變項進行分析，進一步驗證這些變項是否對應召員的保衛臺灣產生顯著影響。

二、威脅感知

Rousseau and Garcia-Retamero研究指出

21 同註13。

22 同註16。

23 同註10。

24 同註13。

25 同註6，頁105-134。

26 同註6，頁105-134。

，²⁷在國際關係中，威脅(Threat)可以分為言詞上(Verbal)的威脅和實質上(Physical)的威脅。言詞上的威脅通常包括兩種方式：威懾性(Deterrent)威脅與強制性(Compellent)威脅。其中威懾性威脅的目的是阻止目標採取威脅者不希望的行為，而強制性威脅則是要求目標採取某些特定行動。此外，Obaidi et al.認為威脅的傳遞不僅限於言語表達，亦能夠藉由非語言訊號來進行，²⁸例如威脅者將軍隊進入戒備狀態或將部署至爭議邊界等方式，傳達威脅意圖。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尤其是在處理嚇阻、衝突或戰爭等議題時，政治領袖對威脅的判斷，不僅直接影響國家採取對抗或妥協的戰略選擇，其公眾對威脅感知也會間接塑造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²⁹因此，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威脅感知被視為一個關鍵概念，表示國際體系行為者(Relation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Actors)如何看待其他行為者之行為對其安全所造成的潛在威脅，而威脅感知往往是國際危機、衝突甚至是戰爭的核心因素。³⁰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領

域研究生內心感受到中共對臺灣在軍事、經濟制度及政治體制的威脅程度就是威脅感知。³¹

當今日討論臺灣面臨的威脅感知議題時，可以觀察到來自中共的文攻武嚇已經成為最主要威脅之一，這些威脅涵蓋許多面向，包括政治上的壓迫、外交上的孤立、文化上的滲透以及經濟上的掣肘，不僅對國軍力量的結構與部署產生影響，也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與心理層面造成壓力。³²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的內容提到，近年來，中共持續對臺灣採取灰色地帶的混合式威脅，透過多種威嚇策略，包括調整機場兵力部署、出動軍機與艦艇遇過海峽中線、侵犯臺灣防空識別區以及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實戰化軍事演練等，試圖以不對稱手段削弱臺灣政府的公信力，並擾亂軍民士氣，對臺灣構成持續性的壓力與挑戰。³³

過去的文獻顯示，近幾年臺灣面對來自中共的灰色地帶威脅，不僅讓臺灣民眾的警覺性提高，更促使更多民眾支持臺灣政府增加國防開支以應對中共的衝突襲擾。³⁴從威脅感知的觀點來看，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的威脅感知

- 27 Rousseau, D. L., & Garcia-Retamero, R. (2007). Identity, power, 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5), pp. 744-771.
- 28 Obaidi, M., Kunst, J. R., Kteily, N., Thomsen, L., & Sidanius, J. (2018). Living under threat: Mutual threat perception drives anti-Muslim and anti-Western hostility in the age of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8(5), pp. 567-584.
- 29 李冠成，〈民眾的威脅感知〉，《國防情勢特刊》，第15期，2021年12月，頁29-37。
- 30 Miguel, F. M. S. (2022).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alist and the liberal accounts. *Brazi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pp. 483-509.
- 31 田漢平，〈威脅感知與安全化論述：模擬決策訓練之實證分析〉，(桃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 32 康迪恩，〈認同與轉變：中華民國(臺灣)軍民關係的認知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博士論文，2016)。
- 33 中華民國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年9月13日，<<https://www.mnd.gov.tw/PublishForReport112.aspx?title=%u8ecd%u4e8b%u520a%u7269&Types=112%u5e74%u570b%u9632%u5831%u544a%u66f8%u5c08%u5340&SelectStyle=112%u5e74%u570b%u9632%u5831%u544a%u66f8%u5c08%u5340>>，(檢索日期2024年8月12日)。
- 34 李冠成，〈從民調談如何強化新制教召的支持〉，《國防安全雙週報》，第50期，2022年3月，頁25-30。



，確實會對臺灣民眾產生心理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威脅感知不僅影響個人，也會促使整體社會更加團結，進而提升對國防政策的支持與自我防衛意願，共同採取保衛臺灣行動來維護臺灣的安全以及穩定，這與方琮燦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³⁵另一方面，政大選研中心、TVBS民調中心、匯流民調等民調機構在國防安全議題的民意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顯示多數臺灣民眾內心的首要威脅感知就是中共可能武力犯臺，並且成為保衛臺灣與激發抗敵意志的重要驅動力。

綜上所述，應召員在面對中共至今從未放棄武力犯臺的威脅感知，不僅未能削弱臺灣民眾的信心，反而激發了更高的保衛臺灣意願與更堅定的保衛臺灣決心，成為臺灣維護自身安全的重要基石，故本研究推論以下研究假設：
H₁：「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三、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美國協防臺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為了穩定臺海局勢，於1954年與中華民國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僅以軍事合作為基礎，也涵蓋社會、經濟與政治等面向合作。其中，第七艦隊協防臺灣的軍事行動最為人熟知。³⁶在1958年的823砲戰中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得到了具體實踐，美國根據條約提供防禦援助，並與中華民國軍隊進行聯合軍演。但隨著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隨之終止，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國會透過立法形式支持臺灣的《臺灣關係法》，並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³⁷《臺灣關係法》明確規範了當臺灣遭受外部威脅時，美國政府應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確保臺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意味著美國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仍能以法律形式維持對臺灣安全的承諾。³⁸

此外，美國對臺政策自1979年以來經歷多次調整，從長期採取戰略模糊立場，意即不明確承諾防衛臺灣，也不放棄對臺灣的支持，從而讓中共不敢輕啟戰端，臺灣也不至於過度挑釁中共，而近年逐漸轉向戰略清晰，尤其是川普(2017-2021)與拜登(2021-2025)政府時期，表現出對臺灣更明確的支持態度，並且通過多項友臺法案與軍售案，強化臺灣的防禦能力。³⁹除了2020年的國防授權法要求美國軍艦定期巡航臺灣海峽，2023年更進一步明確承諾未來五年提供臺灣軍事援助，維持臺海的安全與穩定，即便美國內部對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仍有爭論，但對外已經釋放出支持臺灣與履行安全承諾(Security Commitment)的明確訊號，以應對中共日益增強的軍事壓力。⁴⁰

35 同註10。

36 同註8。

37 陳偉華，〈美國總統公布對臺軍售的時機選擇：行政部門通知國會審查的分析〉，《問題與研究》，59卷第3期，2020年9月，頁81-122。

38 王紹經，〈美國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政策對臺海安全影響之分析〉，《國防雜誌》，38卷第2期，2023年6月，頁57-80。

39 陳世民，〈習近平的戰略轉向與臺海局勢的變遷：2012-2018〉，《遠景基金會季刊》，20卷第2期，2019年4月，頁49-93。

40 同註10。

康育菱研究提及1979年為了聯中制蘇，⁴¹美國選擇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共建交，導致許多臺灣民眾內心感受美國是否為一個值得信賴的盟友，當臺灣遭遇外部威脅時，是否能夠依照《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確實履行承諾臺灣安全，也一直存有疑慮，由此得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是指臺灣20歲以上成年人在情感上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一種主觀心理感受。方琮熾研究顯示雖然過去臺灣民眾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相對較低，⁴²但在中共對臺威脅遽增的趨勢下，當臺灣民眾感受到美國與臺灣站在同一陣線上，相信美國的安全承諾，願意提供軍事援助，不僅有助於增進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程度，還會提高臺灣民眾自我防衛的信心與能力。

過去文獻顯示，如果民眾知道大國願意提供軍事援助，甚至承擔戰爭代價的情況，將會對自己國家的防禦能力抱持著相當程度的信心。⁴³Yeh and Wu認為臺灣受限於軍事國力不可能自行發起戰爭，⁴⁴倘若面對不可避免的戰事，必須依賴大國的軍事援助與支持，尤其是假如臺灣宣布獨立後，引起兩岸戰爭時，美國願意出兵保衛臺灣，則臺灣民眾保衛臺灣的意願也會隨之提升。李冠成與游清鑫提出相似的研究成果，⁴⁵認為兩岸發生軍事衝突時，美

國願意出兵協防臺灣的可能性越高時，臺灣民眾願意上戰場保衛家園的意願也會更高。Wu et al.研究指出，⁴⁶美國高度關注臺灣的區域穩定性與安全性，持續在臺灣海峽從事軍事活動，顯著影響多數臺灣民眾的防衛態度，若美國在臺海衝突中展現對臺灣的軍事援助意願，將進一步提升臺灣民眾保衛臺灣的決心與行動力。美國在對臺軍售、軍事援助以及中共武力犯臺時，確實履行對臺的安全承諾，提供臺灣防衛支持，從而讓臺灣民眾感受到安全保障。⁴⁷

綜上所述，當中共對臺灣發動武力攻擊時，應召員內心知覺美國會履行對臺灣的安全承諾，提供必要的協防措施，則應召員保衛臺灣的意願將會相對提高，故本研究推論以下研究假設：

H₂：「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四、愛國心

Berns主張愛國心(Patriotism)是民眾對國家的深厚情感與熱愛程度，⁴⁸並且在必要時，願意為了國家利益或安全，犧牲個人的生命。然而，愛國心(Patriotism)的核心概念是基於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Approach)，由Huddy and Khatib於2007年所提出，並主張愛

41 同註8。

42 同註13。

43 Labs, E. J. (1992).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1(3), pp 383-416.

44 同註9。

45 同註6，頁105-134。

46 Wu, W. C., Sun, M. C., Fu, W. C., & Huang, W. J. (2023).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he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Quarterly*, 256, pp. 1085-1098.

47 同註10。

48 Berns, W. (1997). On patriotism. *Public Interest*, 127, pp. 19-33.



國心是形成穩固公民關係的重要基石，包含對國家的忠誠度(Loyalty)、對國家的情感認同以及對國家優勢地位的信仰。⁴⁹

先前研究指出，愛國心的內涵包括個人內心對民族認同的愛國心(National Identity)，倘若具備高度愛國心時，會展現對國家的高度認同感。⁵⁰個人對國旗或國歌的象徵性愛國心(Symbolic Identity)，在看到國旗飄揚或國歌響起時，內心充滿了深厚的愛國情懷，這種情感不僅激發了對臺灣的認同與自豪，也展現了對臺灣的忠誠。⁵¹個人積極參與並支持國家政策的建設性愛國心(Constructive Patriotism)，透過強化公民教育，不僅能夠讓臺灣民眾更深入瞭解國防的重要性，同時也能夠培養公民責任感、激發愛國情懷，並提升對國家安全的重視，更重要的是，還會有效提高臺灣民眾保家衛國的意願。⁵²個人消極認同國家政策的盲目性愛國心(Uncritical Patriotism)，每個人會因其對國家發展的期望、個人的價值觀或愛國情懷等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會根據個人判斷，對國家政策或國家領導人的行為表現持有不同盲目的支持態度。⁵³

過去的文獻表示，Yeh and Wu研究指出，⁵⁴臺灣民眾的愛國心與其對臺灣人的認同程度密切相關，當臺灣宣布獨立並可能引發兩岸戰

爭時，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臺灣民眾通常更願意挺身而出，為保家衛國而戰。李冠成與游清鑫研究發現，⁵⁵臺灣人認同在國防行動中的重要性無法忽視，臺灣人認同感越強烈時，不僅會展現出強烈的愛國心，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的威脅感知，自我防衛意願也顯得特別堅定與積極。李雅琦研究也指出，⁵⁶具有高度臺灣認同感且以身為臺灣人為榮的民眾，通常展現出更強烈的愛國心，並且願意為守護臺灣奮戰。

綜上所述，應召員作為受過軍事教育的群體，在面對中共可能對臺灣的武力威脅時，願意站出來保衛臺灣，展現強烈的愛國心與保衛家園的決心，並且透過對國旗、國歌及國家政策的支持，進一步表現對臺灣的高度認同，甚至是當情勢需要時，應召員更會展現出無私的精神，為了國家安全而犧牲奉獻，故本研究推論以下研究假設：

H₃：「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五、國軍信任感

信任感(Trust)是指在互動過程當中，某一方對另一方的相信程度，而信任建立取決於對方的執行能力、正直誠信以及可靠度等面向的表現。⁵⁷Caforio認為信任的構成可以分為三個

49 陳柏榮，《義務役士官兵之愛國心、專業承諾、組織公民行為及新聞媒體使用情形之相關性研究：以臺北市地區義務役憲兵弟兄為例》，(臺北：國防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50 同註18。

51 同註49。

52 同註10。

53 Huddy, L., & Khatib, N.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 pp. 63-77.

54 同註9。

55 同註6，頁105-134。

56 同註16。

57 傅文成、黃琨戡，〈募兵行不行？國軍募兵廣告的效能檢驗：調節焦點與社會距離的觀點〉，《復興崗學報》，第116期，2022年6月，頁1-39。

部分：⁵⁸行為、認知與情緒，倘若違反上述條件，可能會導致雙方缺乏信任基礎，甚至產生不信任感，所以信任感被視為互動關係中，維持雙方合作關係的重要基石。此外，信任感與信心(Confidence)雖然在核心概念有些相似，但實際上存在不同意涵。信任感是指相信其他人是值得依賴的，通常涉及對其他人的期望，而信心則是指某件事在掌控之中。雖然兩者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會交疊，但在實證研究中，特別區分信任感或信心對於實證結果的影響並不明顯。⁵⁹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將信任感的概念延伸至國防安全議題中，過去的文獻指出，在國軍信任感議題中，信任感來源不僅僅限於軍隊組織的信任，⁶⁰還包含對國防政策的信任。⁶¹

劉大華研究指出，⁶²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臺的威脅下，政府希望提升民眾對軍隊的信任感來加強國防支持，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策略方向，主因是軍隊信任與國防支持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透過加強溝通、透明化軍事政策以及展現國軍專業能力，能夠有效爭取臺灣民眾的信任感，進一步凝聚全民對國防的支持態度

。李冠成研究指出，⁶³對國軍防衛能力有信心的臺灣民眾，通常更願意在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上戰場保衛自己的家園。方琮熾表示提高國人對國軍防衛能力的信心，⁶⁴將會促使不同政治立場的臺灣民眾，特別是統獨與高學歷族群展現團結精神，共同捍衛家園的決定，進一步積極參與保衛臺灣的行動。林顯桐研究提出相似看法，⁶⁵認為國防信任是指臺灣民眾對國軍的信心，認為國軍有能力在援軍到達前保護臺灣，並且在必要時願意為國家奮戰，這種信念也與保衛臺灣意願具有密切相關，代表當臺灣民眾對國防信任感越高時，保衛國家的意志通常也會越強。

此外，李冠成研究發現對於國軍部隊訓練有信心的臺灣民眾，⁶⁶通常也會較支持新制教育召集制度，主因是希望透過國防政策的改革進一步提升國防實力，並確保臺灣安全。黃海龍研究發現，⁶⁷應召員普遍認同全民國防的推動可以增強國民對國家安全的信心，而後備動員合一與常後一體的政策，確實能夠提升後備部隊的整體戰力，實施新制教育召集也對強化臺灣國防力量的長遠發展具有正面影響。

58 Caforio, G. (2008).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public trust, and public interest. *Connections*, 7(4), pp. 95-100.

59 Siegrist, M., Gutscher, H., & Earle, T. C. (2005). Perception of risk: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trust, and general confidenc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8(2), pp. 145-156.

60 鄭敬諺，〈組織信任與公正對軍隊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以角色定義幅度為中介變項〉，(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61 劉如鈞，〈從個人背景、國防政策探討高中職學生從軍意願之關聯：以國立嘉義高工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62 劉大華，〈1995至2006年我國民眾軍隊信任與國防支持的轉變〉，《復興崗學報》，第107期，2015年12月，頁31-56。

63 李冠成，〈俄烏戰爭下臺灣民眾自我防衛意識的持續與變遷〉，《國防安全雙週報》，第52期，2022年4月，頁9-15。

64 同註10。

65 同註10。

66 同註39，頁25-30。

67 同註13。

綜上所述，應召員內心對於國防政策及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心程度，將會直接影響在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時，是否願意挺身而出與保衛臺灣的意願強度，信任感程度越高，應召員的意志力與行動力也會越強，進一步影響臺灣整體防衛力量的效能，故本研究推論以下研究假設：

H₄：「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相關因素，並透過文獻回顧確立研究構面（見圖2-1），包括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以及國軍信任感。控制變項是應召員背景變項的年齡、最高學歷、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以及家戶年所得；自變項為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和國軍信任感；依變項則是應召員保衛臺灣的意願，區分為對「自身」、「他人」與「整體社會」保衛意願的不同評估，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欲驗證的研究假設：

H₁：「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₁₋₁：「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₁₋₂：「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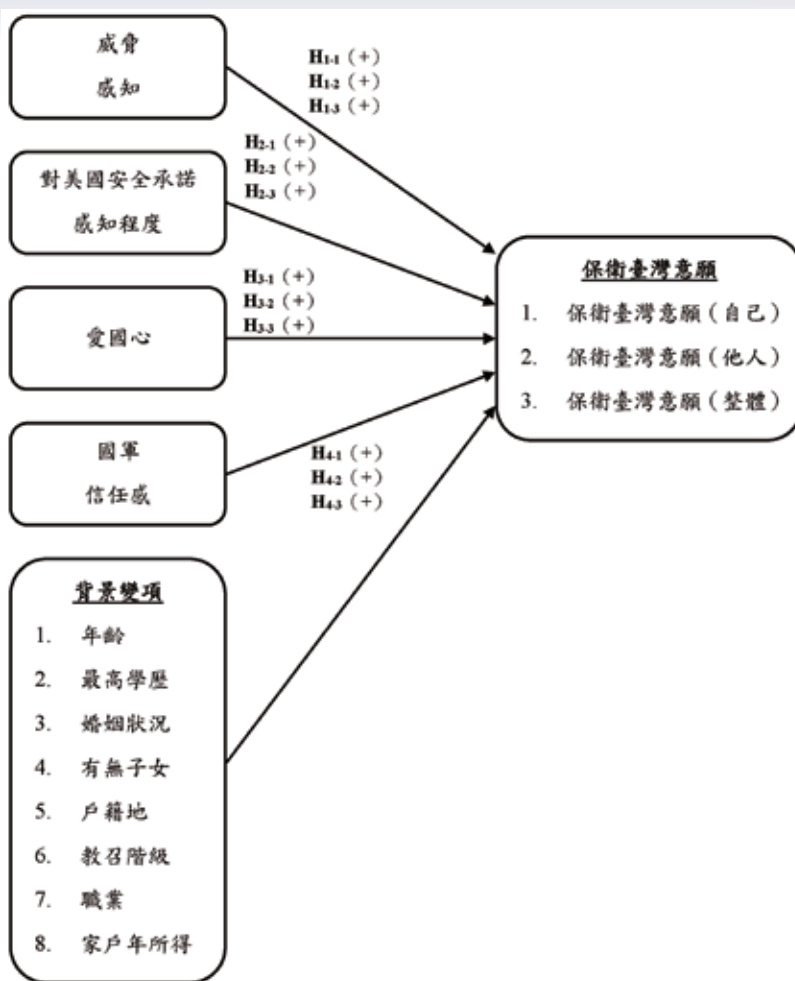


圖2-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₁₋₃：「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₂：「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₂₋₁：「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₂₋₂：「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₂₋₃：「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₃：「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₃₋₁：「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₃₋₂：「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₃₋₃：「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₄：「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₄₋₁：「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₄₋₂：「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₄₋₃：「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二、問卷調查程序

本研究的對象是應召員，問卷調查依年度教育召集訓練流路於2024年11月至12月期間，針對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區各選定一個正在進行教育召集訓練的「營」級後備部隊進行問卷調查，目標樣本量為900至1,200名應召員，以確保統計分析結果具備足夠的代表性。

調查期間也透過各部隊的協助，並以「連」為單位，配合教育召集訓練課程安排，於部隊解召前一天(第13日)夜間課程的綜合座談時間進行。

表2-1是問卷調查情況，本研究總共發放1,121份，分別分配於北部地區410份、中部地區388份及南部地區323份，並且回收1,095份問卷，其中北部地區404份、中部地區377份、南部地區314份，回收率為97.68%。經過有效問卷篩選作業後，刪除95份無效問卷，最終獲得1,000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21%。此外，本研究定義無效問卷包括以下情況：

- (一)所有衡量問項均勻選同一選項。
- (二)漏答題數過多。
- (三)整份問卷空白。
- (四)僅勾選背景變項。

三、變項衡量

(一)威脅感知

本研究將威脅感知重新定義為「應召員內心知覺中共對臺灣在軍事層面的威脅程度」，陳膺昇提及威脅認知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是.81，本研究參酌陳膺昇量表作為發展威脅感知量表之重要依據。⁶⁸本研究威脅感知量表共計五個衡量問項且皆為正向題，例題如：

表2-1 問卷調查情況表

區域	發放數	回收數	回收率	無效數	有效數	有效問卷回收率
北部	410	404	98.54%	24	380	92.68%
中部	388	377	97.16%	39	338	87.11%
南部	323	314	97.21%	32	282	87.3%
總計	1,121	1,095	97.68%	95	1,000	89.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我覺得中共對臺灣的威脅正在不斷增加」與「我覺得中共會威脅到臺海的穩定發展」。採用Likert五點量表計分，得分越高表示應召員內心知覺的威脅程度越高；反之則威脅程度越低。

(二)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本研究將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重新定義為「應召員內心知覺當中共武力犯臺時，美國會提供必要協防，並履行對臺灣安全保障承諾的信心」，參酌方琮熾、康育菱量表作為本研究量表的設計依據，共計三個衡量問項且皆為正向題，例題如：「我覺得美國2023年國防授權法說未來五年要提供臺灣軍事援助，有助於臺海的穩定與安全」與「我覺得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是值得信賴的」。計分也是採用Likert五點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應召員內心知覺美國對臺灣安全保障承諾的信心越強；反之則越弱。

(三)愛國心

本研究將愛國心重新定義為「應召員除了在情感上對臺灣的認同感，還會透過對國旗、國歌及國家政策，展現出熱愛與積極的態度」，劉致偉提及愛國心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是.82，參酌劉致偉編製愛國心量表作為發展愛國心量表的重要依據，其中區分民族認同的愛國心、象徵性愛國心、建設性愛國心與盲目性愛國心四個構面，共計八個衡量問項且皆為正向題，⁶⁹例題如：「我以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為榮」、「當看

到國旗飄揚時，我會感覺很好」、「我會認真工作，讓臺灣朝向更好的方向邁進」與「我會支持我國的領導人，即便我未必認同他的所有行為」。計分也是採用Likert五點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應召員內心知覺的愛國心越高；反之則越低。

(四)國軍信任感

本研究將國軍信任感重新定義為「應召員內心知覺在國防政策及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心程度」，劉如鈞和黃海龍提及國防政策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分別是.81與.90，鄭敬諺發展軍隊組織信任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為.92，⁷⁰故本研究參酌黃海龍、劉如鈞和鄭敬諺相關量表作為本研究發展國軍信任感量表的設計依據，共計六個衡量問項且皆為正向題，例題如：「我覺得國軍防衛臺灣能力是值得信任的」與「我覺得國軍守護國人的承諾是可靠的」。採用Likert五點量表進行計分，得分越高表示應召員內心知覺國軍的信任感越高；反之則越不信任。

(五)保衛臺灣意願

本研究將保衛臺灣意願重新定義為「應召員內心知覺在中共武力犯臺或兩岸衝突時，選擇挺身而出及保衛臺灣的意願強度」，參酌林顯桐量表作為本研究發展保衛臺灣意願量表的重要依據，⁷¹共計四個衡量問項且皆為正向題，例題如：「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與「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認為臺灣民眾普遍

68 同註17。

69 同註18。

70 同註60。

71 同註10。

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計分則是採用Likert五點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應召員內心知覺保衛臺灣的意願越高；反之則越低。

(六)控制變項

由於不同成長背景、工作環境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等因素的影響，應召員在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及保衛臺灣意願可能會有所不同，為獲得較符合應召員情境的統計結果，本研究參考林顯桐、康育菱與黃海龍的研究內容，進一步納入年齡、最高學歷、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以及家戶年所得等背景變項進行分析，說明如下。另一方面，由於是否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往往牽涉到多重因素，除了應召員個人之外，家庭因素也可能是重要角色。基於這個考量，在所得方面的調查選擇家戶年所得，而非個人年所得，會是一種較為周延的方式，也可以提供更具代表性的經濟背景資訊，並且降低應召員的抗拒心理，充分反映出挺身保衛臺灣的真實想法。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回收的有效問卷輸入Excel試算表，並透過IBM SPSS統計軟體來執行各項統計分析，相關內容簡述如下所示：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先透過「次數分配」和「百分比」來呈現應召員在年齡、最高學歷、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家戶年所得等背景變項之分布情況，再透過「平均

數」與「標準差」來呈現應召員對威脅感知量表、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量表、愛國心量表、國軍信任感量表、保衛臺灣意願量表等衡量問項之同意程度的分布情況。

(二)信度分析

為檢驗問卷資料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換言之，檢驗應召員對各量表衡量問項之同意程度的穩定性。邱皓政(2019)指出信度分析常用的衡量指標是「Cronbach's α 值」，如果Cronbach's α 值大於0.7，表示研究量表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水準；反之，若 α 值小於0.5，意味著問卷資料的可信程度非常低，建議刪除低信度的衡量問項。因此，本研究參考邱皓政論點，⁷²以「Cronbach's α 值」來測量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三)效度分析

結束信度分析後，本研究繼續檢驗問卷資料的測量結果是否具備足夠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本研究對各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在進行因素分析時，邱皓政建議先檢視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分析，⁷³可以採用KMO值與巴式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來判斷。其中KMO值越大，表示衡量問項之間的相關性越高，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建議KMO值至少要大於0.6。巴式球形檢定的 p 低於0.05，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相關矩陣中具有共同因素，同樣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在本研究中，採用了主成份分析法與最大變異數旋轉法，針對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及保衛臺灣意願等進行因

72 邱皓政，《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與R資料分析範例解析》，(臺北：五南出版社，2019)。

73 同註72。

素抽取與轉軸分析。最終保留共同性大於0.5、特徵值大於1以及因素負荷量大於0.5的衡量問項，並為各因素命題適切的名稱，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有效性與解釋力。

(四)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是檢驗兩個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情況，相關分析常用的衡量指標是「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如果係數值大於0.7，代表呈現高度相關；低於0.4為低度相關，如果介於0.4～0.7之間，表示兩個研究變項之間具有中度相關。

(五)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是建立迴歸模型來檢驗研究變項的關聯強度以及方向，然而在建立迴歸模型時，需要先行設定自變項以及依變項。⁷⁴有鑑於此，為驗證H₁至H₄是否成立，本研究先透過「多元線性迴歸分析」依序討論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關係，其次，為了進一步找出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最關鍵因素，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逐層討論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於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特性

本研究樣本的背景為2024年11月至12月期間實施教育召集訓練的後備部隊，總共獲得有效問卷1,00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9.21%。為瞭解應召員背景變項在年齡、最高學歷、婚

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家戶年所得的分布情況，本研究採用「次數分配」和「百分比」來說明研究樣本特性，詳見表3-1。

表3-1 應召員背景變項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表

背景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年齡	20歲(含)以下	6	0.6
	21～30歲	766	76.6
	31～40歲	201	20.1
	41歲(含)以上	27	2.7
最高學歷	高中職(含)以下	307	30.7
	專科	55	5.5
	大學	545	54.5
	研究所(含)以上	93	9.3
婚姻狀況	已婚	176	17.6
	單身有對象	433	43.3
	單身無對象	391	39.1
	無	904	90.4
有無子女	有	1位	4.3
		2位	4.6
		3位	0.7
	無	7	0.7
背景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戶籍地	北部地區	451	45.1
	中部地區	296	29.6
	南部地區	253	25.3
教召階級	士兵	725	72.5
	士官(含士官長)	244	24.4
	尉級軍官	29	2.9
	校級軍官	2	0.2
職業	警消公教人員	64	6.4
	農林漁牧	17	1.7
	工商服務業	761	76.1
	高科技產業	71	7.1
	自由業	4	0.4
	學生	5	0.5
	家管	8	0.8
	其他(含無業、退休等)	70	7.0
家戶年所得	未達40萬	10	1.0
	40萬～未達60萬	85	8.5
	60萬～未達80萬	144	14.4
	80萬～未達100萬	144	14.4
	100萬～未達120萬	178	17.8
	120萬～未達140萬	142	14.2
	140萬～未達160萬	65	6.5
	160萬～未達180萬	60	6.0
	180萬～未達200萬	38	3.8
	200萬以上	134	13.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74 同註72。

二、敘述性統計分析

為瞭解應召員對各量表(包括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以及保衛臺灣意願)衡量問項同意程度的分布情況，本研究採用「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分析。

(一)威脅感知

問項代號「2-3：我覺得中共對臺灣的威脅正在不斷增加」的平均數最高(3.88)，表示多數應召員認同中共對臺灣的威脅感持續增強，可能跟近年來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局勢有關。其次依序是問項代號「2-1：我覺得中共的整體國力比臺灣強盛許多」的平均數是3.68，表示受到軍事力量、國際影響力以及經濟規模，多數應召員認同中共的整體國力比臺灣更具優勢；問項代號「2-4：我覺得中共會威脅到臺海的穩定發展」的平均數為3.55，表示多數應召員認同中共的不友善行動不僅會帶來威脅，也會對臺海局勢的穩定性與區域和平構成挑戰；問項代號「2-2：我覺得共軍的作戰能力比國軍強」的平均數是3.03，表示多數應召員認同中共在作戰能力比臺灣具有優勢。問項代號「2-5：我覺得中共會威脅到我的人身安全」的平均數最低(2.90)，表示部分應召員雖然認同中共對臺灣確實存在威脅感，但直接威脅到個人生命的感受相對最低。整體而論，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多數應召員內心知覺中共對臺灣在軍事層面威脅感知的平均數是3.41(標準差.83)，低於中間值，並未感受高度的威脅感知，故呈現「普通」程度的看法。

(二)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的敘述性統

計分析結果，平均數最高(3.73)是問項代號「3-2：我覺得美國2023年國防授權法說未來五年要提供臺灣軍事援助，有助於臺海的穩定與安全」，表示多數應召員對此表達肯定看法，認為美國軍事援助措施確實有助於維持臺海的穩定性。其次是問項代號「3-1：我覺得美國對臺軍售是確保臺灣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道屏障」，平均數是為3.55，表示多數應召員認同在維護臺灣安全上，美國對臺軍售是提高臺灣防衛能力的重要支柱。平均數最低(3.07)是問項代號「3-3：我覺得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是值得信賴的」，表示部分應召員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感受程度相對較低，可能是對國際政治現實或美國政策變化的擔憂。

整體來看，分析結果指出本研究多數應召員內心知覺當中共武力犯臺時，美國會履行對臺灣安全保障承諾的平均數是3.45(標準差.97)，同樣低於中間值，對美國安全承諾的看法偏向中立或不確定，也存在「普通」程度的看法。

(三)愛國心

愛國心的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問項代號「4-1：我以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為榮」的平均數(4.24)最高，表示多數應召員對身為中華民國國民抱有高度的自豪感。其次依序是問項代號「4-2：我很認同自己的國家」的平均數是4.20，表示多數應召員對臺灣的國家認同感相當強烈；「4-5：我會認真工作，讓臺灣朝向更好的方向邁進」的平均數是3.90，表示多數應召員展現積極態度，將以實際行動促進臺灣更進步；「4-3：當看到國旗飄揚時，我會感覺很好」與「4-4：當聽到國歌響起



時，我會感覺很好」的平均數分別是3.83與3.71，表示多數應召員對於象徵臺灣的國旗與國歌仍有相當程度的情感共鳴；「4-6：我會以建設性的方式來提出對臺灣有益的建議」的平均數是3.62，表示多數應召員對參與公共事務抱有一定程度的支持態度；「4-7：我會支持我國的領導人，即便我未必認同他的所有行為」的平均數是2.93，表示多數應召員即便對臺灣領導人展現支持態度，但不見得會完全認同其領導行為與政策內容。平均數最低(2.77)的是問項代號「4-8：我會無條件支持所有的國家政策」，表示部分應召員對於國家政策的支持態度並非無條件支持，仍保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整體來看，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多數應召員對臺灣的情感認同度較高，並且會透過國旗、國歌和國家政策的支持，展現出熱愛且積極的態度，其平均數是3.65(標準差.83)，超過中間值，展現出偏向「同意」程度的看法。

(四)國軍信任感

國軍信任感的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問項代號「5-2：我覺得國軍守護國人的承諾是可靠的」和「5-8：我覺得推動全民國防可以凝聚國民信心」的平均數(3.76)最高，表示多數應召員對國軍守護臺灣的承諾及全民國防政策抱持高度的支持與信心。其次是問項代號「5-9：我覺得推動後備動員合一、常後一體可以提升後備戰力」，平均數是為3.55，表示多數應召員對後備動員整合與提升後備戰力的政策展現肯定態度。接著是問項代號「5-1：我覺得國軍防衛臺灣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和「5-3：我覺得國軍有在持續提升自

我防衛的能力」，平均數都是3.40，表示多數應召員認同國軍整體防衛能力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平均數(2.76)最低是問項代號「5-10：我覺得實施14天新制教育召集是有意義的」，表示部分應召員對新制教育召集的實際效益存有疑慮，建議相關部門與單位應加強政策溝通與成效宣導，進一步提高應召員與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整體來看，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多數應召員內心知覺國防政策和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心較為普通，整體平均數是3.44(標準差.91)，低於中間值，對國軍信任感的態度偏向不確定或中立現象，故呈現「普通」程度的看法。

(五)保衛臺灣意願

保衛臺灣意願的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問項代號「5-6：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願意發揮所長參與防衛活動」的平均數(3.31)最高，表示多數應召員願意充分運用自身專業技能投入到保衛臺灣的活動。其次依序是問項代號「5-4：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平均數是3.29，表示多數應召員對於參與保衛臺灣行動展現高度支持態度。「5-7：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會義無反顧投入戰場」的平均數是3.19，表示多數應召員也做好親自上戰場的心理建設與準備。而平均數最低(2.91)的是問項代號「5-5：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認為臺灣民眾普遍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表示部分應召員對於他人是否願意共同保衛臺灣的看法較為保留，此結果可能某種程度也反映出當前社會凝聚力與集體防衛共識仍有待強化。

整體來看，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多數應

召員在面對中共武力犯臺或兩岸衝突時，對於選擇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意願並未達到很高的積極態度，其平均數是3.18(標準差1.08)，也低於中間值，所以呈現「普通」程度的看法。

三、信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在完成各量表敘述性統計分析後，為瞭解應召員在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及保衛臺灣意願等量表之同意程度的穩定性，採用Cronbach's α 值來測量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當Cronbach's α 值小於0.5，顯示問卷資料的可信度非常低；介於0.6至0.7之間，代表可信度尚可；介於0.7至0.8之間，表示具有良好的可信度；大於0.8，代表可信度相當良好。因此，本研究對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以及保衛臺灣意願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威脅感知的 α 值是.676、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的 α 值為.766、愛國心的 α 值是.854、國軍信任感的 α 值為.816、保衛臺灣意願的 α 值是.961，均大於0.7，意味著本研究問卷資料具有相當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此外，本研究再進一步檢視各變數刪除問項後 α 值的變動情況，發現刪除問項代號「4-8：我會無條件支持所有的國家政策」後，愛國心的Cronbach's α 值會略為上升0.007(.846→.853)，考量到無論是否刪除4-8，整體信度已經超過0.8，具備優良信度，選擇維持目前的衡量問項。若刪除問項代號「5-5：當中共武力犯臺時，我認為

臺灣民眾普遍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後，保衛臺灣意願的Cronbach's α 值則是會上升0.025(.961→.986)，為測量應召員對他人面對中共武力犯臺而展現保衛臺灣意願的情況，且整體信度已經超過0.9，具備很高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同樣選擇維持目前衡量問項，繼續後續的統計分析。

(二)效度分析

為瞭解本研究的各量表是否具備足夠的建構效度。依照邱皓政論點指出，⁷⁵建議採用KMO值與巴式球形檢定來檢視研究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當KMO值小於0.6，代表不適合進行分析；介於0.6至0.7之間，表示勉強能做因素分析；介於0.7至0.8之間，顯示尚可進行因素分析；大於0.8表示適合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採用KMO值大於0.6且巴式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p < .05$)進行因素分析的事前檢驗。此外，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與最大變異數旋轉法進行因素抽取與轉軸，並選取共同性大於0.5、特徵值大於1以及因素負荷量大於0.5的衡量問項。

威脅感知的因素分析結果，KMO值是.643，巴式球形檢定的卡方值是1059.038(自由度為10)且具有統計顯著($p < .001$)，表示威脅感知量表的五個衡量問項勉強能進行因素分析，進一步檢視分析結果，呈現一個共同因素，解釋變異量是68.488%，五個衡量問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68至.870之間且共同性均大於0.5，符合過去文獻的因素萃取結果，證明威脅感知量表具有相當不錯的建構效度。

75 同註72。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的因素分析結果KMO值是.634，巴式球形檢定的卡方值是1018.702(自由度為3)，也達到統計顯著($p < .001$)，顯示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量表的三衡量問項同樣是勉強能進行因素分析。再檢視因素分析結果，萃取一個共同因素，解釋變異量是69.465%，三個衡量問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715至.897之間，共同性依序是.768、.804與.511，也符合過去文獻的因素萃取結果，證明本研究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第一次執行愛國心量表的因素分析，發現問項代號「4-6：我會以建設性的方式來提出對臺灣有益的建議」的共同性是.382，小於0.5，刪除該問項後，執行第二次因素分析，KMO值是.755，巴式球形檢定的卡方值是4906.940(自由度為21)，同樣達到統計顯著($p < .001$)，代表愛國心的七個衡量問項尚可能進行因素分析。進一步檢視因素分析結果，僅取得一個共同因素，解釋變異量是72.996%，七個衡量問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78至.924之間，共同性也都大於0.5，符合先前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因而證明本研究愛國心量表具有相當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國軍信任感的因素分析結果，KMO值是.749，巴式球形檢定的卡方值是卡方值是2803.639(自由度為15)，同樣具有統計顯著($p < .05$)，顯示國軍信任感的六個衡量問項尚可進行因素分析。再檢視分析結果，萃取出一個共同因素，解釋變異量是75.245%，六個衡量問項的因素負荷量依序是.880、.788、

.855、.864、.909與.749，共同性則分別為.810、.743、.735、.776、.850與.601，亦符合過去文獻的因素分析結果，足以證明本研究國軍信任感量表存在良好的建構效度。

保衛臺灣意願因素分析結果，KMO值是.833，巴式球形檢定的卡方值是6440.095(自由度為6)，符合統計顯著($p < .001$)，代表保衛臺灣意願量表的四個衡量問項適合執行因素分析。繼續檢視分析結果，萃出一個共同因素，解釋變異量是89.432%，四個衡量問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853至.979之間，共同性都大於.5，也符合先前文獻的因素分析結果，證明保衛臺灣意願量表具有相當不錯的建構效度。

四、相關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自變項(包括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以及國軍信任感)與依變項(保衛臺灣意願)都是順序變項，為瞭解兩者之間的相關情況，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相關係數」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詳見表4-1。邱皓政指出，當皮爾森相關係數小於0.4，代表存在低度相關；介於0.4至0.7之間，顯示具有中度相關；大於0.7，呈現高度相關。⁷⁶

根據表4-1得知，首先，威脅感知與保衛臺灣意願呈現顯著「低度」的正相關($r = .200, p < .001$)，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同樣與保衛臺灣意願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r = .211, p < .001$)。其次，愛國心與保衛臺灣意願的相關性較高，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r = .565, p < .001$)。最後，國軍信任感

76 同註72。

表4-1 各研究變項的相關分析結果表

研究變項	有效樣本數=1000				
	威脅感知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愛國心	國軍信任感	保衛臺灣意願
威脅感知	(.676)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197***	(.766)			
愛國心	.231***	.306***	(.854)		
國軍信任感	.199***	.301***	.544***	(.816)	
保衛臺灣意願	.200***	.211***	.565***	.606***	(.961)

註：+p<0.1，*p<0.05，**p<0.01，***p<0.001；信度值Cronbach's α 位於對角線上的括弧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與保衛臺灣意願也呈現顯著「中度」的正相關($r = .606, p < .001$)。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由於相關分析無法直接推斷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僅能作為初步檢驗變項之間的相關情況，因此，本研究後續將進一步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深入探討控制變項、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於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程度。

五、迴歸分析

為瞭解控制變項、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關係，本研究採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進行四個研究假設(H₁至H₄)的驗證。由於控制變項可能會潛在影響依變項，藉由投入迴歸模型並加以控制，可以更準確地分析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進而提升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因此，本研究將年齡、最高學歷、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及家戶年所得等控制變項都編碼為虛擬變項。首先是年齡，將20歲(含)以下和21~30歲合併為「30歲(含)以下」，編碼為0，將31~40歲和41歲(含)以上合併為「31歲(含)以上」，編碼為1；最高學歷方面，將高中職(含)以下和專科合併為「副學士(含)以下」，編碼為

0，將大學和研究所(含)以上合併為「學士(含)以上」，編碼為1；本研究為瞭解有無家庭親屬或伴侶羈絆對於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婚姻狀況則將已婚和單身有對象合併為「已婚或有對象」，編碼為1，單身無對象則編碼為0，一併投入投入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有無子女方面，無子女編碼為0，有子女編碼為1；戶籍地方面，將北部地區編碼為1、中部地區編碼為2、南部地區編碼為3，各自創造虛擬變項，並以「北部地區」為參照組投入迴歸模型；教召階級則將士兵編碼為1、士官編碼為2、軍官編碼為3，各自創造虛擬變項，並以「士兵」為參照組投入迴歸模型；職業方面，將警消公教人員編碼為1、工商服務業編碼為2、高科技產業編碼為3、其他合併編碼為4，各自創造虛擬變項，並以「工商服務業」為參照組投入迴歸模型；最後是家戶年所得，將未達40萬、40萬~未達60萬、60萬~未達80萬、80萬~未達100萬合併為「100萬以下」，編碼為0，將100萬~未達120萬、120萬~未達140萬、140萬~未達160萬、160萬~未達180萬、180萬~未達200萬、200萬以上合併為「100萬以上」，編碼為1。

(一)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表4-2顯示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的結果，



包含四個迴歸模型，分別觀察四個自變項的影響。先將控制變項與威脅感知投入迴歸模型1，再將控制變項與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投入迴歸模型2，繼續將控制變項與愛國心投入迴歸模型3，最後將控制變項與國軍信任感投入迴歸模型4。

1. 威脅感知對保衛臺灣意願

表4-2迴歸模型1的 $Adj-R^2$ 是.088，代表威脅感知能解釋保衛臺灣意願8.8%的變異量，整體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F = 8.424, p < .001$)。在控制變項中，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166, p < .001$)、教召階級：士官($\beta = .108,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6, p < .01$)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相對於戶籍地為北部地區、教召階級為士兵以及職業為工商服務業，其戶籍地在南部地區、教召階級是士官、職業為無業及退休之應召員，擁有相對較高的保衛臺灣意願。

威脅感知對保衛臺灣意願具有統計顯著水準($\beta = .203, p < .001$)，且具有正向影響，這意味著應召員內心知覺中共對臺灣在軍事層面的威脅程度越高，通常對保衛臺灣會展現出強烈的決心與意願。

2.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對保衛臺灣意願

表4-2迴歸模型2的 $Adj-R^2$ 是.087，表示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可以解釋8.7%的保衛臺灣意願，且整體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F = 8.369, p < .001$)。結果發現在控制變項中，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163, p < .001$)、教召階級：士官($\beta = .134,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5, p < .01$)的影響依然顯著。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對保衛臺灣意

願具有統計顯著水準($\beta = .203, p < .001$)，也具有正向影響，表示當應召員感受到美國承諾履行對臺灣安全保障的力度越高，有助於增進保衛臺灣的可能性。

3. 愛國心對保衛臺灣意願

表4-2迴歸模型3的 $Adj-R^2$ 是.317，顯示愛國心可以解釋保衛臺灣意願31.7%的變異量，整體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F = 36.671, p < .001$)。在控制變項中，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067, p < .05$)、教召階級：士官($\beta = .060, p < .1$)、職業：高科技產業($\beta = .049, p < .1$)與職業：其他($\beta = .085, p < .01$)的影響依然顯著。家戶年所得($\beta = .051, p < .1$)也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代表相對於家庭年所得為100萬以下，其家庭年所得為100萬以上之應召員，對於保衛臺灣的意願相對較高。

愛國心對保衛臺灣意願具有統計顯著水準($\beta = .538, p < .001$)，代表著應召員內心知覺的愛國心越強烈，則保衛臺灣的意願也會相對地提高。

4. 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

表4-2迴歸模型4的 $Adj-R^2$ 是.381，代表國軍信任感能解釋保衛臺灣意願38.1%的變異量，整體解釋力達到顯著水準($F = 48.214, p < .001$)。結果發現教召階級：士官($\beta = .088,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6, p < .001$)的影響依然顯著。

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具有統計顯著水準($\beta = .594, p < .001$)，有正向影響，表示應召員感受到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可信度越高，將會增加願意投入保衛臺灣的意願。

(二) 階層迴歸分析

表4-2 保衛臺灣意願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

研究變項	有效樣本數=1000			
	依變項=保衛臺灣意願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變項				
年齡	-.011	-.013	-.008	-.011
最高學歷	-.038	-.018	-.005	-.021
婚姻狀況	.001	-.017	.005	.003
有無子女	.046	.045	-.019	.033
戶籍地：中部地區	.006	.006	.001	-.035
戶籍地：南部地區	.166***	.163***	.067*	.024
教召階級：士官	.108**	.134**	.060+	.088**
教召階級：軍官	.052	.048	.034	.044
職業：警消公教人員	-.013	-.019	-.006	-.030
職業：高科技產業	.042	.039	.049 ⁺	.036
職業：其他	.096**	.095**	.085**	.096***
家戶年所得	.040	.047	.051 ⁺	.027
自變項				
威脅感知	.203***			
對美國安全承諾 感知程度		.203***		
愛國心			.538***	
國軍信任感				.594***
Adj-R ²	.088	.087	.317	.381
F值	8.424***	8.369***	36.671***	48.214***

註1：+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2：戶籍地參照組：北部地區；教召階級參照組：士兵；
職業參照組：工商服務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皆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為了找出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最關鍵因素，後續將進一步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逐層討論控制變項、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應

召員自己保衛臺灣意願、他人保衛臺灣意願以及整體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程度。

表4-3的迴歸模型1顯示先投入控制變項的分析結果，整體解釋力是4.8%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 5.197$, $p < .001$)，控制變項的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184$, $p < .001$)、教召階級：士官($\beta = .108$,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 $p < .01$)，皆具有統計顯著，意味著相較於戶籍地在北部地區、教召階級為士兵以及職業是工商服務業的應召員，戶籍地在南部地區、士官階級參與這次教召、無業或退休的職業背景之應召員，表現出更高的保衛臺灣意願。迴歸模型2加入「威脅感知」後，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1的4.8%提升至8.8%($F = 8.424$, $p < .001$)，表示威脅感知能夠增加4.0%的解釋力。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166$, $p < .001$)、教召階級：士官($\beta = .108$,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6$, $p < .01$)的影響依然顯著。而威脅感知會顯著正向影響保衛臺灣意願($\beta = .203$, $p < .001$)，表示當中共在軍事層面對臺灣的威脅逐漸增強，為展現對國家安全的責任感，應召員對保衛臺灣的意願與決心也會相對提高。

迴歸模型3再加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後，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2的8.8%提升至11.5%($F = 10.231$, $p < .001$)，表示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可以增加2.7%的解釋力。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151$, $p < .001$)、教召階級：士官($\beta = .130$, $p < .01$)與職業：其他($\beta = .093$, $p < .01$)的影響依然顯著。威脅感知($\beta = .170$, $p < .001$)及對美國安全承

表4-3 保衛臺灣意願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

研究變項	有效樣本數=1000						
	依變項=保衛臺灣意願						
	模型1 (自己)	模型2 (自己)	模型3 (自己)	模型4 (自己)	模型5 (自己)	模型6 (他人)	模型7 (整體)
控制變項							
年齡	-.002	-.011	-.019	-.013	-.014	.002	-.010
最高學歷	-.028	-.038	-.028	-.008	-.014	-.006	-.013
婚姻狀況	-.007	.001	-.009	.006	.006	.020	.010
有無子女	.043	.046	.047	-.014	.001	.017	.005
戶籍地：中部地區	.016	.006	-.001	-.005	-.032	.046	-.015
戶籍地：南部地區	.184***	.166***	.151***	.062*	-.002	.042	.008
教召階級：士官	.108**	.108**	.130**	.068+	.064*	.028	.058+
教召階級：軍官	.053	.052	.049	.034	.036	.061*	.044+
職業：警消公教人員	-.008	-.013	-.015	-.009	-.025	-.036	-.028
職業：高科技產業	.042	.042	.040	.048+	.042+	.008	.036
職業：其他	.099**	.096**	.093**	.084**	.089***	.054*	.085***
家戶年所得	.038	.040	.047	.052+	.037	.067*	.045+
自變項							
威脅感知		.203***	.170***	.085**	.063*	-.015	.048+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			.170***	.035	-.022	-.008	-.020
愛國心				.507***	.304***	.301***	.317***
國軍信任感					.431***	.338***	.429***
Adj-R ²	.048	.088	.115	.324	.449	.326	.456
△R ²	.048	.040	.027	.209	.125	.002	.132
F值	5.197***	8.424***	10.231***	32.967***	51.789***	31.202***	53.318***

註1：+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2：戶籍地參照組：北部地區；教召階級參照組：士兵；職業參照組：工商服務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諾感知程度($\beta = .170$ ， $p < .001$)都會顯著的正向影響保衛臺灣意願，意味著對多數應召員來說，中共對臺灣的軍事威脅日益增加，而美國展現出履行對臺灣安全承諾的決心，將有助於促進應召員守護自由民主價值的態度，進一步提升保衛臺灣的意

願。迴歸模型4接著加入「愛國心」後，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3的11.5%提升至32.4% ($F = 32.967$ ， $p < .001$)，顯示愛國心會增加20.9%解釋力。除了戶籍地：南部地區($\beta = .062$ ， $p < .05$)、教召階級：士官($\beta = .068$ ， $p < .1$)、職業：高科技

產業($\beta = .048, p < .1$)與職業：其他($\beta = .052, p < .01$)的影響還是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家戶年所得($\beta = .052, p < .1$)也具有統計顯著水準，代表相較於家庭年所得未滿100萬的應召員，家庭年所得超過100萬的應召員，可能因為經濟穩定性較高，對於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意願會有所提升。威脅感知($\beta = .085, p < .01$)與愛國心($\beta = .507, p < .001$)顯著正向影響保衛臺灣意願，顯示當中共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升高時，若應召員的愛國心越強烈，則願意保衛臺灣的意願也會相對提高。

迴歸模型5則是加入「國軍信任感」，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4的32.4%提升至44.9%($F = 51.789, p < .001$)，代表國軍信任感能增加12.5%的解釋力。教召階級：士官($\beta = .064, p < .05$)、職業：高科技產業($\beta = .042, p < .1$)與職業：其他($\beta = .089, p < .001$)的影響依然顯著。威脅感知($\beta = .063, p < .05$)、愛國心($\beta = .304, p < .001$)與國軍信任感($\beta = .431, p < .001$)都會顯著的正向影響保衛臺灣意願，意味著當應召員認為中共未來可能對臺灣進行武力侵犯的威脅越高時，展現出越強烈的愛國心，並且對國軍保衛臺灣的能力越有信心，則未來願意站出來保衛臺灣的可能性就會越高。

迴歸模型6展現各變項對他人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4的32.4%僅略為上升至32.6%($F = 31.202, p < .001$)，代表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只會增加0.2%的解釋力。在控制變項中，

除了職業：其他($\beta = .054, p < .05$)與家戶年所得($\beta = .067, p < .05$)的影響呈現顯著。教召階級：軍官($\beta = .061, p < .05$)也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相較於教召階級是士兵，教召階級是軍官的應召員，面對中共武力威脅時，可能因為保衛臺灣的使命感或責任感更強，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可能性也會越高。愛國心($\beta = .301, p < .001$)與國軍信任感($\beta = .338, p < .001$)皆會顯著正向影響他人保衛臺灣的意願，代表應召員認為社會大眾或同袍展現出的愛國心越強烈，並且對國軍保衛臺灣能力感到高度信任時，確實有助於提高面對中共武力威脅時，選擇站出來保衛臺灣的可能性。

最後迴歸模型7顯示各變項對整體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整體解釋力從迴歸模型4的32.4%提升至45.6%($F = 53.318, p < .001$)，代表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可以增加13.2%的解釋力。教召階級：士官($\beta = .058, p < .1$)、教召階級：軍官($\beta = .044, p < .1$)、職業：其他($\beta = .085, p < .001$)與家戶年所得($\beta = .045, p < .1$)的影響還是維持顯著。威脅感知($\beta = .048, p < .1$)、愛國心($\beta = .317, p < .001$)與國軍信任感($\beta = .429, p < .001$)均對於提高保衛臺灣意願具有顯著且正向影響，其中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的影響尤其顯著，表示這兩個變項在激發應召員或社會大眾保衛臺灣的意願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強化對國軍的信任以及加強愛國教育將成為制定國家安全意識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方向。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進一步將本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整理如表5-1所示：

(一)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本研究證實了威脅感知對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威脅感知是指應召員內心知覺中共對臺灣在軍事層面的威脅程度。基於中共對臺灣的威脅確實是許多應召員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尤其是國際局勢與軍事力量的變化下，這種威脅感不僅容易讓應召員感受到恐懼、焦慮、緊張、不安等負面情緒，還可能會影響臺灣的穩定

發展。當中共整體國力增強與共軍作戰能力提升時，應召員更需具備堅定的信念，強化團隊的意志，並在面臨中共武力威脅犯臺時挺身而出，保衛臺灣的穩定與安全。因此，「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發現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雖然對情勢變化具有較高的敏感度，並且對他人保衛臺灣意願抱持更高期許，但統計結果卻顯示沒有明顯的影響，究其原因可能與多數應召員或社會大眾面對中共威脅時展現的團結決心有關，也就是說，社會大眾是否願意挺身而出保衛臺灣，仍然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或家戶年所得等背景的差異。

表5-1 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 「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1-1: 「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1-2: 「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不成立
H1-3: 「威脅感知」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2: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2-1: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不成立
H2-2: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不成立
H2-3: 「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不成立
H3: 「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3-1: 「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3-2: 「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3-3: 「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4: 「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H4-1: 「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自己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4-2: 「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他人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H4-3: 「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會認為「整體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不會對應召員保衛臺灣的意願產生影響

本研究發現應召員對「美國對臺灣安全承諾感知程度」，不會對其保衛臺灣的意願產生影響。美國安全承諾是指應召員內心知覺中共武力犯臺時，美國會提供必要協防，履行對臺灣安全保障的承諾，這意味著從應召員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防衛意願主要來自內部動機(如威脅感知、愛國心、國軍信任感)，而非外部盟友的承諾，自助才能人助，只有臺灣人民自身願意防衛國家，國際盟友才可能提供協助，所以應召員在決定是否願意保衛臺灣時，並不會因為他們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高低而改變自己的防衛意願，使其不會成為決定防衛意願的關鍵因素。由於美國在2023年國防授權法中明確提到未來五年內將履行對臺灣的安全承諾，並且提供相關軍事援助，也可能讓部分應召員認為「反正美國會協防臺灣，那我就不需要親自投入防衛」，進而降低其積極性。換言之，既然美國已經表態願意介入臺海安全與穩定，部分應召員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努力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這種安全替代效應可能讓某些人會降低自身參與國防的重視程度，反而降低防衛意願，因此導致兩者無顯著關聯。

(三)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迴歸分析結果指出，愛國心對保衛臺灣意願具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而愛國心是指應召員除了對臺灣的情感認同感，對國旗、國歌以及國家政策，也會展現出熱愛的積極態度。這意味著對多數應召員來說，深知

愛國心的重要性，除了會以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感到自豪，深深認同臺灣，也願意努力工作為臺灣的未來貢獻一份力量，甚至是看到國旗飄揚或聽到國歌響起時，會感到無比驕傲，所以在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的威脅時，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可以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保衛臺灣而奮鬥，體現「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具體行動。此外，愛國心不僅能強化個人參與意願，也能提升其對他人與整體社會防衛意願的評估與信任，展現出良好的社會心理連動效果，有助於形成更具凝聚力的全民防衛心理基礎。因此，「愛國心」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四)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實證結果顯示，國軍信任感會顯著且正向的影響保衛臺灣意願，亦為影響保衛臺灣意願最具關鍵性的因素，而國軍信任感是指應召員內心知覺在國防政策及國軍防衛臺灣能力的信心程度。顯示大多數應召員認同國軍一直致力於提升防衛能力，並以守護國人為首要承諾。推動「全民國防」政策，可以凝聚國民信心，有效普及國防意識，強化臺灣的安全基礎。推動「後備動員合一、常後一體」政策，對於提升後備戰力以及確保國防力量的延續性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實施14天新制教育召集的實用性仍需進一步觀察，儘管部分應召員認為對提升國防應變能力有正面幫助；但也有應召員對其成效存疑，特別是在實質訓練成效、個人生活影響與職場協調方面表現出觀望與疑慮。在面對中共可能武力犯臺的情境下，國



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通常會展現出更高保衛家園意願，對於維護臺灣安全也具有較強的責任感，並願意在必要時投入戰場。因此，「國軍信任感」較高的應召員，其「保衛臺灣意願」較高。

二、實務建議

本研究探討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因素，結果顯示「威脅感知」、「愛國心」與「國軍信任感」對其防衛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尤以心理認同(愛國心)與制度信任(國軍信任感)為關鍵因素；而「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則未顯著影響應召員的保衛意願。基於上述發現，本節提出實務面的可行建議，以提升應召員對國防的信心、強化後備戰力，並增進戰備意識與防衛決心。

(一)強化對戰略環境認知與區域情勢理解，提升應召員威脅感知能力

1.深化威脅認知教育

可善用教育召集訓練時機，將臺海安全情勢與中共灰色地帶威脅(如認知戰、資訊戰)納入課程內容，強化應召員對戰略環境的掌握與風險判斷能力，培養面對威脅時的應變心態與危機意識。

2.提升國防政策宣導與資訊透明度

透過新聞媒體、社群平台與紀錄片等多元渠道，持續推廣國防政策內容，確保應召員平時可獲取正確且即時的國防資訊，進而建立對政策的信任感，降低因資訊若差所造成的錯誤認知與疑慮。

(二)穩固國際安全合作，提升應召員對國際盟友的信心

1.加強應召員對美國安全承諾的理解與信任

儘管本研究顯示該變項無顯著影響，但政策層面仍應持續透過美臺軍事交流、聯合訓練與安全合作機制，並在教育召集訓練期間納入相關內容說明，使應召員能夠具體感受到國際安全合作的存在，降低對美國戰略模糊政策的不確定感。並強化其對國際盟友安全承諾與共同防禦機制的理解，以提高應召員對臺灣戰略夥伴的信任。

2.強化對國際安全合作，提升戰略溝通能力

透過政府部門的戰略溝通與公共外交，加強應召員對臺灣在印太區域安全架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提升其對國際支持力量的信心，避免產生「孤立無援」的錯誤想像。

(三)推動國家認同建構，厚植全民防衛共識

1.建立正向國防敘事，強化國家認同基礎

透過歷史教育、文化創作與媒體傳播等方式，建立正向與包容性的國家敘事，減少世代與族群間的疏離感，強化「保衛臺灣是全民責任」的共同信念，進一步鞏固愛國心。另避免國防議題政治化，以全民共同防衛的角度來形塑國防意識，確保不同立場的應召員都能夠將國家安全視為共同責任。

2.推動在地化的全民國防教育

結合地方政府與社區資源，舉辦國防教育論壇、社區防衛演練等活動，使國防意識能夠具體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促進全民對國軍與國防事務的支持度。

(四)提升國軍信任度，強化後備部隊戰力

1.優化國軍形象與溝通機制

持續強化國軍的專業訓練、組織管理與溝通機制，確保國軍能夠維持高專業度與社會信任度，以提高應召員對軍隊專業能力的信任

，並更加認同國軍的價值。

2.精進後備部隊召訓品質，提升質戰感與投入度

應精進召訓內容與方式，使其符合現代戰場需求，以提高應召員對訓練的認同感與投入度。另可導入模擬戰場科技，如VR訓練、協同作戰模擬等，提升召集訓練的實戰化與效能，避免傳統訓練過於形式化。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重點是探討影響應召員對於保衛臺灣意願的相關因素，實證過程中遭遇到幾項限制，說明如下：

首先，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法，透過問卷調查於2024年11月至12月期間蒐集1,000位應召員的資料。儘管問卷設計時參考了過往具備良好信效度的量表作為基礎，但由於僅進行一次橫斷面調查，難以掌握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對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是否會隨時間而改變的動態數據。

其次，由於本研究結果驗證了，威脅感知、愛國心和國軍信任感這三個研究變項，對於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具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然而，研究結果的推論範圍可能有所限制，應該採取謹慎態度，僅適用於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變項，不宜過度延伸至其他未納入討論的研究變項。

再者，本研究問卷調查的時間點為部隊解召前一天，也就是第13天，使得無法有效推論應召員的保衛臺灣意願是否受到新制教育召集制度及相關訓練課程之影響，所以未能完整反映教召訓練歷程影響。

最後，本研究調查範圍涵蓋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針對參與教育召集訓練的後備部隊進行，由於應召員在填答問卷時，研究者未能全程在旁觀察，可能導致資料蒐集過程中出現填答偏誤的情況，以致可能限制了研究結果的普遍性與可靠性，因此在解讀統計數據時，需謹慎考量這些潛在影響。

(二)後續研究建議

參照上述研究限制，本研究提出相對應的建議供後續研究參考，說明如下：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僅是一次性橫斷面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對保衛臺灣意願未呈現顯著影響，推測可能會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例如：美國總統大選、近期川普政府對烏克蘭態度等重大事件發生後，是否對應召員的想法產生改變，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採用縱斷面研究設計，考慮長期追蹤與蒐集不同時間點的問卷資料，深入探討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及國軍信任感等因素對保衛臺灣意願的長期影響。此外，亦可結合質性研究方法，例如：訪談法、參與觀察法或個案研究法，提供更全面且深入的實證結果，進一步補充量化數據的不足，從而更完整地揭示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核心因素與變化趨勢。

其次，在研究變項方面，未來研究可以考慮納入更多可能影響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研究變項，例如：個人價值觀、社會支持、自我認知等，不僅有助於本研究架構更趨完整性，亦可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些變項如何與威脅感知、對美國安全承諾感知程度、愛國心、國軍信任感以及保衛臺灣意願產生影



後備軍人召集訓練

響，從而獲得更全面的研究發現。

再者，為瞭解實施新制教育召集制度是否有助於增進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選擇前期(召集第一天)與後期(同樣選擇部隊解召前一天，召集第13天)，採用前、後測的問卷調查方式，深入分析應召員保衛臺灣意願的變化與成因，進一步提高本研究主題在學術研究與實務領域的具體貢獻。

最後，依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應召員不同背景變項對其保衛臺灣意願的影響有所不同，例：戶籍地、教召階級、職業與家戶年所得，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應召員的不同背景進行更深入的差異分析與討論，以描繪不同族群的防衛傾向與心理輪廓，不僅能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與代表性，還能提供更全面的討論內容，進一步增強本研究主題在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吳純騰少校

陸軍步兵學校(義)預官96年班、後備動員幹部訓練中心動管正規班108年班、國防大學陸軍學院正規班113年班、國防大學陸軍學院聯合作戰研究班114年班、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曾任排長、連長、替代役訓練中心中隊長、動員連絡官，現任後備動員幹部訓練中心教官。

